



2017 年中国两会 专题报道



THOMSON REUTERS
汤森路透



目录

中国总理以中美关系“首问”向世界传递对外开放及发展经济的决心	3
中国“一行三会”合并计划已搁置，MPA 新规成就央行霸主地位.....	6
中国的“蓝天保卫战”面临违法成本低高压执法难的尴尬	8
路透专访：中国银行业不良率已进入持稳状态，风险仍可控--前中行行长.....	10
路透专访：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并未设定任何底线--官员.....	12
路透专访：中国能完成钢铁去产能任务，但行业“春天”言之尚早--石横特钢	14
路透专访：中国企业金融需求多元化，浙商银行将继续发展非信贷业务--董事长.....	16

中国总理以中美关系“首问”向世界传递对外开放及发展经济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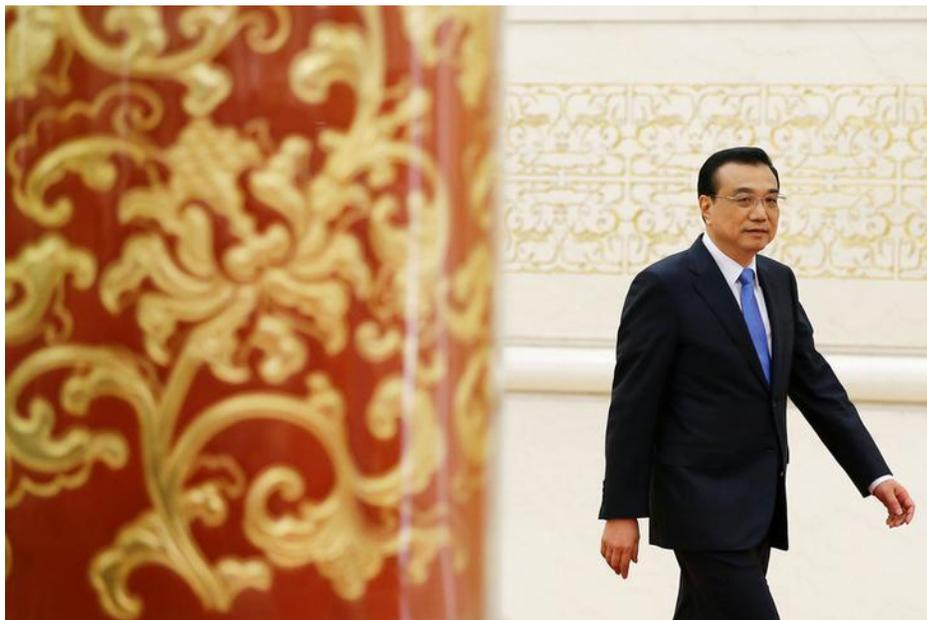
作者 沈燕

路透北京3月15日 - 每年两会收尾的中国总理答记者问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从周三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中美关系作为首个开场问题，不难看出同为“大块头”的中国明确坚持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底限上，表达了对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视及开放政策不变的诚意。

在世界经济和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外在风险下，对中国而言“不发展”则是最大的风险。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调降至6.5%左右则是为了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稳增长的核心是保就业。

“今年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这是很大的外部风险。对中国来讲，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我们保持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本身就是在为世界稳定做贡献。”李克强称。

他表示，如果今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增量比去年还要大，因为这是在经济总量已经超过7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1万亿美元基础上的增长，而且可以带动1,100



万人以上的就业。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低，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情况下推动全球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6.5%左右，并明确提出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这一目标为去年首次提出的6.5-7%经济增速的区间下限，其它主要经济指标亦纷纷调降。

而3%的CPI目标和赤字率亦与去年目标持平，显示求稳的政策底线

下，降速目的旨在为今年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添柴加薪。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是中美关系底线

对于经济正处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相较平稳的中国经济，眼下面临的地缘政治动荡，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以及去年以来屡屡爆出的“黑天鹅事件”等，均显示中国在处理内务的同时，正面临着一个并不太平的外部环境。

这或许也是本届总理发布会首问选择中美关系，以藉此表达中国对外

开放的政策，推进自由贸易的政策没有改变的坚定信心。

“虽然中美关系经历过风风雨雨，但是一直前行，我对此持乐观态度...要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是风云变幻能够动摇的，也动摇不得。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基础，中美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李克强称。

他坦称，中美建交几十年已经有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当然也有分歧，比如在就业岗位、汇率等问题上有些看法不一，或者在安全问题上也有不同认识。

“但是，我们双方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沟通，坐下来谈，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现在两国外交部门正就两国元首会晤进行沟通。我想，中美关系不仅会关系两国利益，而且涉及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我们要维护它前行。”李克强称。

他提到，在全球化进程受到一些非议或者在某些方面有挫折的情况下，中国始终坚持一贯的立场，那就是维护经济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这本身就表明中国是要推动开放。

“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其中也因为中国

一直在坚持不断地扩大开放。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但关起门来也办不好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开放大门会越开越大。当然，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李克强称。

对于中国是否会接棒 TPP，李克强表态：“关于区域的自由贸易安排，涉及中国的，有条件的，我们持开放态度，愿意去进行推动。我们不会越俎代庖，不会超越区域去做不应是中国做的事情。”

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吸引外资在发展中国家仍居首位，达到1,260亿美元。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估，去年和2013年相比上升了18位。

中国商务部此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约77.3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35.7%，比2016年12月降低4.6%。这是过去一年来，中国对外投资首次同比负增长。

经济降速就业就先，高度关注风险点

在回答了诸多涉及外交领域的问题后，李克强也详细阐述了中国今年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强调就业优

先的同时，也对外界担忧的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风险点作了回应。

李克强解释，中国之所以要有6.5%左右的经济增速，稳增长主要还是要保就业。因为就业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是最大的民生。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已经连续四年实现新增城镇就业1,300万人以上，今年更是强调就业优先，就是要保证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把失业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李克强称。

他提到，这几年中国一直处在新成长劳动力的高峰，今年的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光高校毕业生就达795万，创历史新高，还有500万左右的中职毕业生，加上去过剩产能需要安置的几十万转岗职工等等，但中国完全有能力扩大就业，也不会允许出现大规模群体性失业。

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新增城镇就业1,100万人以上，比去年的目标增加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以内。

至于外界担忧的风险，李克强坦言，“除了外部风险外，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风险，像金融领域。对于这些风险点，我们是高度关注



的，发现了会及时处置、靶向治疗，不会让它蔓延。”

但他强调，中国金融体系总体是安全的，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因为有很多应对工具，储备政策许多还

没有用。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没超过3%，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13%，拨备覆盖率176%，这些都超过许多国家，特别是国际所确定的相关标准。

“所以我们是有能力防范风险的，当然，我们在中高速行进当中也会系紧安全带，不会让风险‘急性发作’，更不会发生区域性或者系统性的风险。”李克强说。（完）

中国“一行三会”合并计划已搁置，MPA新规成就央行霸主地位

记者 毕晓雯

路透香港3月15日 - 始于中国股灾的“监管机构改革”风声，在神秘论证近二年后终于划上句号。“两会”期间传出的信息显示，既不是学界此前广议的“英国经验”，也非媒体报导的“银保合并”简单粗暴，而是依然保持现有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模式不变，但会通过更加强化的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方式，实现央行的霸主地位。

也就是说，通过今年正式实施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以及拟出台的大资管监管新规等，央行已提前成就金融监管霸主地位，简单的“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合并模式不再是本届政府所考虑的方案。

而两年前再获重视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则有望获进一步提升，从而令各项监管政策能够在跨界领域实现可落实、有监督。

“一行三会合并、银保合并曾经都讨论过，但现在都是过时的消息了。就是因为不合了，才会传出来被你们媒体知道。”一位金融市场资深



人士戏称，“一行三会暂时不会动了，你们关心关心谁是下任行长才是正事。”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两会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也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有了牌照式管理的基础，在综合经营的大形势下，更应该强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她解释称，过去的监管方式主要是机构监管为主，也就是监管当局对机构设立、撤销、审慎经营进行管理；而“行为监管指的是，即便这个机构的牌照不是我发的，但是你这个机构的功能方面的业务，你还是要到我这里来领取牌照。”

“所以，监管金融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把‘三会’合在一起，或者简单地把‘三会’合到央行。”她认为。

新任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首次亮相的新闻发布会上，也以“谣言”回应了记者关于他是否会“主导三会合并”的提问。

金融协调机制再获重视

总之，综合两会期间的各类信息，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的“一行三会合并”模式已确定将被放弃，而监管协调机制的进一步提升则成为最有可能的方案。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记者会上，也以最近热门的“资产管理统一监管新规”为例指出，目前，“一行三会一局”--也就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之间已经在许多比较大的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可能会进一步细化以后，作出一些初步规范。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还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而且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还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现在还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

201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设置了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以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进行协调。

但直到2015年股灾发生后，这一协调机制才再度进入实际意义上的

启动，并进入广大投资者的视线中。业界当时并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当下的分业监管已严重滞后于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分业监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此后，关于“一行三会”将合并的可能性及必要性的研究、分析以及媒体报导，就一直是此起彼伏。

MPA 与大资管监管方案已实际树立央行地位

其实，在MPA推出伊始，业内人士就惊呼，央行实际上已提前掌握了“一行三会”的监管大权。自2017年一季度起，该评估开始正式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这将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表外业务风险的管理，从源头杜绝影子银行的进一步膨胀。

路透曾有一篇分析文章就提出，央行管不了金融机构的资产扩张行为，就管不好货币政策。而MPA考核，可以说管住了水笼头，也自然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扩张行为有了约束力。

“通过控制银行，控制了非银。通过控制资金源头，控制杠杆风险。”一银行资深人士就表示，“这相当于，通过控制地基，就控制了建筑。”

吴晓灵此次也表示，只要能完成稳定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更好地让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管理相结合，并形成有效的货币政策的调控体系，什么监管体制都是可以的。

由于中国人大在立法程序中所具有的权力，吴晓灵关于金融监管机构改制的讲话信息也就更值得思考与分析。（完）

中国的“蓝天保卫战”面临违法成本低高压执法难的尴尬

作者 沈燕

路透北京3月13日 - 当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已然成为中国诸多城市的“奢侈品”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态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只是，若要让打赢这场战争不是只停留在口号上，中国首先要解决违法成本低而高压执法难的尴尬。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环保治污依然是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他们呼吁，中国应将强排超排的企业上升到法律层面处罚，而不仅仅是运动式治理和行政罚款了事，在完善各项法规制度的同时确保高压执法能落地更是关键。

“蓝天绿地是我们所有老百姓的生活向往，去年天津的一个代表团到沙漠，他们在绿地上看星星和银河，说这是几十年没有看到的，希望这种生活能够成为常态。”全国政协

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彪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称，现在的空气治理已经不是一日之功，是长期的积累，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他建议，在蓝天绿地工程、蓝天保卫战中，既要注重减法，还要注重加法。现在的减法就是节能减排、能源结构的调整；所谓的加法，应该在一些大中城市大量建公园、种树、种花、种草。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要科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

中国此前发布防治大气污染的“大气十条”，2017年是第一阶段实施的最后一年。据环保部统计，2016年，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达到4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0%，优良天数比例为78.8%，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

有法治基础更须执法力度

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屡屡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背后，折射出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难以为继的现状，也更坚定了政府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

只是相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法治环境以及国民素质教育等诸多软实力明显滞后，并凸显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王文彪就指出，要想打好蓝天保卫战，有三个需要，需要全民参与、企业参与、市场参与；需要执纪机构执法机关参与；需要重拳出击，进行治理。

据环保部数据，去年各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12.4万余份，罚款66.3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分别增长28%和56%。环保部挂牌督办27起重点环境违法案件，组织查处取缔“十小”企业2,465家。

而在全民、企业和市场参与的同时，不仅需要国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环保生活方式的转变，更需要有完善



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加大对违法者的惩戒力度，显然更具现实意义。

政协委员陈东征在小组讨论时表示，强排超排的处罚就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而不仅仅是行政处罚，应该从法律层面对产生污染的企业处罚，而不应该采取运动式的管理办法。

中国自2015年1月1日生效实施新环保法。新环保法赋予了查封、扣押、停产、限产、按日计罚、案件移送等举措，相关处罚实现了“损害担责”。

两会期间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长陈吉宁就表示，环境守法态势正逐步形成。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是落实环保法重中之重。

他介绍，环保部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出台配套文件35件，包括一些司法解释。这些文件的出台，为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提供了具体规范和依据。

“大家知道，环保法对企业处罚比较重要的手段，一个是查封扣押，一个是停产限产，一个是按日连续处罚。通过明确执行规定，2016年这几类案件分别是查封扣押9,976件，停产限产5,673件，按日连续处罚1,017件，分别比2015年增长138%、83%和42%。这成为

遏制企业环境违法的一个重要手段。”陈吉宁称。

根据此前发布的一项由环境资源法学专家完成的新环保法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就认为，中国新环保法实施一年来，严格执法、督政问责等措施的实施遏制了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初步恢复了环境法治秩序。

治污地方政府担主责，高压执法面临考验

虽然有新的环保法为中国“蓝天保卫战”保驾护航，近几年中国重拳治理亦不遗余力，但要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在治污以地方政府为主下，如何在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法理上取得平衡，并确保对违法者高压执法无疑是一场考验。

环保法总则第六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的环境质量负责。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是落实环保法重中之重。

“一些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法落实任务的分工不明确，而且这种不明确越到基层越衰减。环保法规定的部门职责只有一半在环保部门手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环保部门的职责只占三分之一，所以下一步要明晰各部门的责任，才能更好地落实环保法。”陈吉宁称。

他坦称，新环保法实施两周年以来，主要有四方面问题，包括有一些制度还不健全，个别条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说，环保法明确要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但是制约的法律手段现在看还不足。

“有些条款在操作层面上执行起来还有困难，需要完善。比如按日计罚这个效果非常明显，但是法律要求企业违法排污拒不改正的，才能启动按日计罚。打个比方，如果你上公共汽车，抓到你没有票，得先补票，如果拒绝补票，才能够实行按日处罚。”陈吉宁称。

此外，未批先建问题，虽然法律规定了责令停止建设、恢复原状等措施，但对监管部门授权有限，缺乏有力的强制手段，难以及时制止该类违法行为。

企业环保的主体责任仍然落实不够，各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包括偷排偷放时有发生，以及环境执法能力不足，影响法律实施的进程和效果。

“总的看，我们有很多地区特别是在区县级环境监管的人员严重不足，装备老化等问题十分突出，很难适应现在日益繁重的监管任务。”陈吉宁称。（完）

路透专访：中国银行业不良率已进入持稳状态，风险仍可控——前中行行长

作者 张晓翀

路透北京3月14日 - 中国监管层正努力提高金融风险防控水平，将防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原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表示，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进入持稳状态，且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较高，因此不良贷款风险仍可控。

他并建议，推进资本市场建设，降低企业杠杆率，银行可以债转股方式参与企业重组，而企业重组须通过“市场加行政”的办法实施。

“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比前几年略微上升，但总的判断还是这个风险仍基本可控。”李礼辉在“两会”期间接受路透专访时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将基本保持在1.7%左右。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1%，较上季末上升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75.5%，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他指出，中国经济近年来经历了非常大的调整下行，但中国银行业在不良贷款率的控制上较好。由于中国经济现在基本上处于筑底企稳的阶段，若后期趋于稳定，银行的不良贷款将不会上升。

他认为，中国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和资本本身是能够覆盖风险的，据其多年的从业经验，银行最终损失额至多为不良贷款额的一半左右。

对于目前市场普遍关注的，银行关注类贷款或未进入不良贷款的逾期贷款可能有多方面的问题，他分析称，目前这一比例不是很高，未来也不会特别多。

中国经济放缓对银行业冲击日渐凸显，分析人士预计，在2017年随着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改善，以及债转股和不良资产证券化(ABS)等工作推进，不良贷款上升势头有望趋缓。不过，尽管银行资产质量出现一定程度的向好，但现在判断不良贷款率见顶可能还为时尚早。

债转股方式参与企业重组

对于未来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问题，李礼辉认为，银行要承受一定的损失，接纳资产重组的方案。银行如果采用债转股等方式，参与企业的管理，并通过后期资源配置帮助企业起死回生，回报还是要比破产高得多。

他称，企业的债务重组、资产重组甚至是破产必须通过市场办法加上行政办法一起来实施，完全市场化的办法不会得到特别好的效果，同时要根据不同的企业做不同的判断。

“所有这类债务重组必须是股东、商业银行和政府几家一起出力，这才有可能成功。”李礼辉说。

他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政府不能替破产企业去偿付债务，但解决冗余工人安置等问题，必须靠政府出手出力出政策，否则重组工作是做不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债务重组、包括一部分债转股是必要的。”他称，有必要多设立一些资产管理公司，

使其成为资产证券化中重要的经营平台，未来资管公司的业务机会会越来越多。

去年10月债转股方案正式落地，此举从而有望激发银行加快不良处置积极性，并有利缓解其资本压力。单纯债转股无法真正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因股权要求回报率高于债权；债转股政策能否真正达到目的，关键在于能否改善公司治理，而银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待实践检验。

加强统一监管

针对目前正在推进的大资管统一监管，李礼辉表示，现在的问题是参与大资管业务的金融机构太多，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尺度宽严不一，管理上会造成有些空白，也会引起监管套利。

目前，中央政府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正在推进大资管统一监管。资管业务本质是信托，从目前信托业

务的数据分析，中国大资管业务的总体资产质量问题还不是太大。

中国资管行业近年来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亦积聚重重风险。据路透此前获得的文件显示，中国央行有意在去杠杆及防风险思路下，统一监管资管行业，强化资管业务的宏观审慎管理，强调金融机构不得开展表内资产管理业务，明确要求逐步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对于这些金融监管机构关于跨平台、跨市场、跨机构的业务，要有统一的监管制度，统一的监管原则、统一的监管标准，有了这个就不怕了。”李礼辉称。

尽管中国央行有意统一金融资管行业监管规则，但监管层内部仍有分歧。路透援引相关文件指出，不同监管机构的分歧重点包括以募集方式对资管产品进行分类统一规制、结构化产品及杠杆设置、建立综合统计制度，以及明确监管问责机制等。（完）

路透专访：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并未设定任何底线--官员

作者 孙琦子

路透北京3月13日 - 中国外汇储备2月重回3万亿美元关口，而人民币兑美元也迟迟没有跌破7。这两个心理关口一直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牵动着市场敏感神经；但监管层似乎并未把这两个数字看得太重。中国央行营业管理部主任周学东表示，其实央行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并未设定任何底线。

他在两会期间接受路透专访时并称，3万亿美元外储仍处于比较高水平。过去两年央行动用了一些外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导致其总量有所下降，主要目的是防范外汇市场剧烈波动，避免汇率“超调”。而目前所采取的一些“稳汇率”、“稳外储”的做法，实质是对预期的管理和引导。

“据我所知，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从未设定任何底线，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到了某个节点就会猜测，猜测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预期；其实，我们并不担心外储和汇率具体变动到哪个位置。”他称。

中国央行上周二公布，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0,051.24亿美元，环比增加69.2亿美元，结束此前连续七个月下降，并再度重返3万亿美元关口上方。

不过周学东同时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和外汇储备维持在一定水平，是一个基本的政策取向。

他进一步解释道，之前人民币升值太快太高，可能人民币存在一定高估，因此一定会有回调；但对贬值预期如果不加以引导管理，就会形成汇率剧烈回调，甚至超调，这对宏观经济很不利，对微观主体也不利。

“单边预期并不好，不同主体想法不一样。比如，进口企业、出国旅游和留学的人都希望人民币升值，而出口企业则希望人民币贬值。”他说。

怎样理解汇率制度

周学东并认为，所谓的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也是建立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几句话要理解起来并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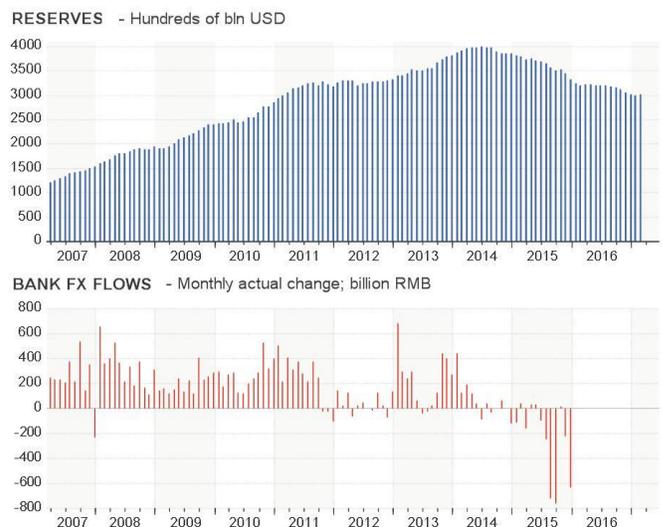
“市场供求为基础”，表示人民币的汇率总体上是由市场决定的。这个市场，既包括国际外汇市场，也包括国内外汇市场，这两个市场是联动的。

“人民币汇率最终是由市场决定的，要相信市场，尊重市场，因为市场的力量太强大了，这不是说哪个国家哪个政府能轻易改变的。”他称。

其次，“参考一篮子货币”，是说参考的是人民币对一组货币的汇率变动，而不只是对美元。很多人只看对美元的汇率，是不准确的。

而“有管理的”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是说管理预期。市场对预期形成是动态的，一旦形成预期又会影响人民币汇率。因此，预期是外汇市场的一部分，而且有时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比较大。因此，管理和引导预期，就非常重要。外界看到的央行和外管局采取的一些措

China reserves and bank FX flows



Source: 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PBOC, 3/15/2017

施，也主要是管理预期，并加强合规性和真实性审核。

“我们并不刻意追求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因为不可持续。短期可能还有效，时间稍微长点根本不可持续。”周学东称。

他强调，目前看，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波动，处于基本稳定的态势。总之，尊重市场，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总体由市场决定，是一个重要原则。

他并认为，除了市场供求关系外，决定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多与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近年来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上，出口规模和贸易顺差仍比较大。同时，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也在逐步改善。这些因素，都是中国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保持合理、基本稳定的基础。

“实际上，现行的外汇政策并没有变化，市场化改革的趋向也没有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和对外开放的格局也没有变化。但是在管理预期时，确实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他称。

有针对性限制不合理流出

在周学东看来，这两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大大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外商来华投资，中国成了资本净输出国。特别是去年，资本项下对外跨境

支付比较快，有些项目可能不一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有些可能是炒作房地产等境外资产，也有的项目可能缺乏真实性，甚至做套利交易等。

“这些情况，引起国家多个部门的重视，我们遵照总行和总局的要求，加强资本跨境流出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是非常必要的。”他称。

中国2016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ODI）同比增长44.1%，达到1,701.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且已超过同期实际使用外资（FDI）规模。

周学东指出，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外汇储备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尽管中国外储较多，也要珍惜着用。

他并表示，外界理解的资金流出“限制”，主要是对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缺乏真实性的或不合规的资本流出，这些的确需要限制。但对有真实性贸易或投资背景的，或是国家鼓励的购汇需求，完全可以得到满足，只是增加一些审核的时间和环节，并不存在限制的问题。

“加强投资贸易的真实性审核，加强合规性审查，这是必要的。另外，过去鼓励资金流出的一些优惠政策，现在可能就要取消了，所以大家感觉政策变了，但其实基本的政策框架并没有变。”他称。（完）

路透专访：中国能完成钢铁去产能任务，但行业“春天”言之尚早--石横特钢

作者 李文科

路透北京3月9日 - 钢铁业去产能仍是中国经济重大课题，对于今年提出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目标，大型民营钢铁企业--石横特钢集团董事长张武宗认为，目标比较适宜，完成任务没问题，预计今年去产能主要对象还在地条钢、违规建设和污染企业方面，不过中国钢铁去产能任务仍艰巨，今年粗钢产量仍将超过7亿吨。

石横特钢集团董事长张武宗在“两会”期间接受路透专访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进行中，但中国今年的投资量仍很可观，包括小城镇建设、高铁、水利和城市管网等投资将推动中国钢材消费维持高位，短期料尚难现负增长，但近期钢价上涨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行业春天已至。

“2017年钢材需求是刚性的，去掉5,000万吨的任务也是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的，不仅是去产能的问题，还要照顾需求问题，”张武宗指出，“去得太多太快，满足不了需求，中国总不能进口钢材吧！”

他解释称，全国地条钢有8,000万吨，加上根据环保和布局需要而搬迁钢铁产能，还有违规建设和环保不达标的钢铁产能，把上述产能去掉基本就可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

他并称，中国2016年去产能的力度和效果超预期，推动中国钢材供需进入基本平衡格局，由于中国当前钢材需求总体上是刚性需求，这种基本平衡的格局料能至少维持两年，当然不排除中间出现波动。

不过他也强调，尽管钢材价格最近出现恢复性上涨，但中国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仍不到10%，当然由于环保等政策约束加大，钢企利润两极分化日益扩大，一些管理比较好、成本较低的钢企和管理水平差、成本较高的钢企的吨钢利润差异高达700元人民币左右。

调查数据显示，部分钢企吨钢固定成本，即期间费用与边际成本之和高达1,000元以上，而好一点的钢企则只有300-400元。

国家统计局之前公布，2016年中国粗钢产量8.1亿吨，同比增长1.2%；同期进口铁矿石10.2亿吨，同比增长7.48%。

中钢协报告之前称，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地条钢、中频炉等落后产能将逐渐退出市场，但从总体情况看，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



钢铁业春天只是“表面上的”

中国供给侧改革效果显现，钢铁企业供需基本趋向平衡，推动钢价阶段性上涨，但张武宗直言，钢铁业的春天不过是“表面上的”。

他强调，未来钢铁行业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这个挑战仍在淘汰过剩产能和治理环保方面，“这两方面的工作要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钢铁业）表面看来不是冬天，好像是春天来，但我们这个春天就像现在地球上不正常的天气一样，

说暖就暖，说冷就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春天真的到了，”张武宗比喻称。

在他看来，要淘汰过剩产能就必须处理僵尸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将会成为一大阻力，银行如果短时间暴露过多坏账，就会积累金融风险，这也是政府和监管层不愿意看到的。

环保也是一样，对于很多处于困境中的企业而言，环保投入对企业经营是雪上加霜，很多企业难以承受，都需要一个过程。

实际上，随着中国结构转型的推进，不仅仅是钢铁行业，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日子也都不会好过。

当然，部分效益较好的钢铁企业就有机会进行一些行业并购等完善自身产业链，来或者修炼内功，包括提升管理制度、产品和体制创新能力等。

理性看待钢价上涨

的确，去年中国钢材价格一轮上涨，被认为是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所致。张武宗指出，去年中国去产能的确平衡了钢材的供求关系，钢材价格的上涨是结构性的，属于恢复性上涨，但由于现存钢企产能仍不是满负荷运行，产能释放仍有较大空间，钢价高位运行难以持久。

他强调，现在中国钢材市场总体是供需平衡，但钢价的高位可以说是一种“心理高位”，是钢企长期亏损后对钢材涨价的强烈渴望所致，难以持续。

“在供求平衡的基础上，（钢材）涨价问题上钢企共识性特别强，你涨我也涨，你降我再看看，维持钢价的心理高位，这种心理高位是不能持久，持续几个月是可能的，长期是不可能的。”张武宗认为。

他还强调，要理性看待钢价上涨，防范价格过度上涨，维持价格在一个理性的水平，过高的钢价可能带来短期的收益，但长期来看对企业和经济损伤很大。

具体来讲，一方面，过高的钢价可能给钢铁继续去产能带来阻力，另一方面还会拉动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原材料价格上涨这会吞噬钢企的超额利润部分，钢材价格过度上涨的部分并不会带给钢企实惠，反而会导致贸易逆差。

的确，钢价维持高位最终将损失钢企自身的利益空间，并损及宏观经济，尤其对平衡国际收支增加压力，亦令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更进一筹。

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2月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同比增长4.2%，进口同比增长44.7%；2月贸易逆差603.60亿元人民币，为三年来首见逆差。分析人士指出，进口超预期增长导致了逆差，而这与春节因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直接相关，

按照去年每吨铁矿石价格上涨30美元计算，去年中国进口约10亿吨铁矿石，那么中国为此多支付300亿美元。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之前发布报告称，2017年，中国钢材市场需求有望保持稳定，但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更加复杂，钢铁行业仍处于转型脱困阶段，总体市场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钢价难以大幅上涨。（完）

路透专访：中国企业金融需求多元化，浙商银行将继续发展非信贷业务--董事长

作者 马蓉

路透北京3月8日 - 中国日趋严格的金融监管措施正在给金融机构带来压力。全国人大代表、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表示，银行业的确需要严格监管，但严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不应是对立关系。信贷只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品种，而当前企业金融需求日趋多元化，未来浙商银行仍将继续推动理财、资管计划等非信贷业务的发展。

他在“两会”间隙接受路透专访时并指出，在监管趋严及防风险、去杠杆的背景下，银行资产扩张速度将放缓；虽然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快速攀升势头已得到遏制，但是否进入拐点仍需要观察。

“现在贷款只是服务经济的一个金融品种，对很多企业来说，贷款不是他需要的（金融产品）。”沈仁康称，“所以我们觉得通过资管计划、理财对接，实际上是满足了实体经济需求，监管部门要正确地评估、理解。”

中国资管行业近年来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亦积聚重重风险。据路透此前获得的文件显示，中国央行有意统一监管资管行业，强化资管业务的宏观审慎管理，包括强调金融机构不得开展表内资产管理业务、禁止资金池操作，统一杠杆要求并消除多层嵌套等。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此前亦指出，针对近年来银行非信贷资产快速增长及表外业务的不断扩大，总的趋势是

要把该纳入表内的业务纳入表内，这是一个基本的审慎的原则。

沈仁康称，日趋严格的监管政策并没有“把路堵住”，仍留有业务发展空间。“从我们的业务方向上来说，会继续推动上市企业、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包括跨国并购、行业整合的一些业务需求，以及支持政府产业基金。”他称。

他并表示，从政府设立产业基金的角度看，中国已转变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通过基金的模式投资于政府有意培育的产业，而在此过程中，亦需要银行非信贷业务的支持。

不过，银行非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金链条拉长及脱实向虚等问题。有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金融部门内部融资活动规模上升较快：截至2016年三季度，中国全部债务融资金额为26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金融部门内部融资高达87万亿，占比为33%。



沈仁康认为，应客观看待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当前金融市场改革日益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及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均使得金融体系内的需求上升。同时，对银行来说，传统的信贷市场“突然放大”成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等在内的全市场，银行在这些市场中有很多经营盈利的空间和需求。

“也不能说‘脱实向虚’就不对，世界上其他银行都在这些领域有很好的经营能力，...但是把过度的资源投过去之后，可能会影响到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服务，这个是尺度上出现了问题。”他称。

浙商银行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浙江省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于去年3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其去年中报显示，截至2016年6月末，该行实现净利润47.35亿元，同比增长42.37%；不良贷款率1.33%，比年初略增0.10个百分点。

银行资产增速将放缓，不良率持稳难言拐点

沈仁康表示，在防风险、去杠杆、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银行的资产扩张速度必将放缓，预计今年21家全国性银行的增速将低于10%。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月末，商业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长15.2%，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同比增长9.3%，股份行、城商行总资产增速分别为15.1%、23.1%。

“对大银行来说，可能本身已经到了增速比较慢的阶段，更多的依靠存量调整来调整它结构的阶段，而对于一些像我们这样正处‘青少年’阶段的银行来说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压力。”他称。

但从稳健经营的角度看，他认为，浙商银行在近两年通过大力度创新发展较快，目前也需要放慢脚步，梳理现存的问题，消化监管政策带来的增长方面的压力，以更稳健的发展，“比如原来表外的很多东西进表内了，我要很多的风险加权资产去消化这些东西。”

沈仁康并强调，严格的监管和创新之间不应成为对立的关系，在严格监管的背景下仍要大力鼓励银行去创新；若非如此，银行无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也是没有未来的。

银行资产质量方面，他认为，银行不良资产在过去几年持续攀升后已相对趋稳，但中国银行业消化不良资产还需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

“我个人判断不良率上升的势头基本稳住了，不排除还有波动。”他称，“但是不是稳定了，是不是到拐点了，可能还需要一个阶段来判断。”

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周二亦表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现在比较平稳，下一步走势还需要观察，但“至少不会轻易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1.91%，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较上年末上升0.07个百分点。

对于浙商银行未来的业务布局，沈仁康透露，其准备在香港设立分行及投资银行，以为其客户提供国际化业务。

“今年在香港的分行将开业，...我们的投行--浙银国际也在筹建中，但（投行）今年能否开业还要看审批进度。”他称。

中国周日发布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完）